

歷史與空間

兒時的九大碗

羅大佳

「九大碗」就是鄉村的場場宴，現在被稱為宴席。

農村人辦九大碗，一般是給兒女操辦結婚喜事。之所以被稱為「九大碗」，是因為每桌宴席必須擺上九個菜餚，家庭條件好點的，會增加到十多個菜。這些菜餚中，主菜是圓子、酥肉、蹄子肉、涼拌肉、肘子、渣粉子，配菜有竹筍、海帶、粉條、豆腐、紅蘿蔔、白蘿蔔、芹菜、蔬菜湯等。另外一個碗裡，裝着糖果和糕點。

那時農村窮，一個月難得打一回牙祭，遇到生產隊有人辦「九大碗」，總是歡天喜地，認為可以飽餐一頓肉食了。但鄉里鄉親之間，也有不成文的規矩，辦「九大碗」每家除了請來幫忙的人及正宴那頓去「趕人情」的人外，頂多帶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就行了。家裡姊妹多，出於對能被父母帶去吃九大碗的姊妹的嫉妒，戲稱他為「趕路狗」。「趕人情」就是「送禮」，那時候的禮，也就是五斤大米，關係好的，送七斤。至於是否送錢，除了親情的遠近外，還得看家庭條件的好壞，如果要送，兩三元錢也就行了，如果送上五元或十元，簡直是送了一筆巨款，非常了不得。

「九大碗」一般辦三天。第一天，花宴；第二天，正宴；第三天，回門。花宴那天早飯後，鄉里鄉親扛飯桌的扛飯桌，背砂罐的背砂罐，拿盆子的拿盆子，搬凳子的搬凳子，從四面八方來到主人家裡幫忙。主人家委託一位支客師，負責給眾人安排活計。於是洗菜的，剝蒜的，煮飯的，主廚的，忙得不亦樂乎。

冬臘月辦九大碗，主人家一般會殺一頭豬。花宴中午和晚上那頓飯，就會擺一盤豬肝炒菜、豬肉炒菜和旺兒湯，其餘是蔬菜，也不管是幾個碗，能飽飯就行了。如果不是臘月，主人家就從農貿市場買肉回來，花宴那天桌上也就只有一個菜葉了。

正宴那天是很熱鬧的，中午是九大碗的重頭戲。新娘要進門，鞭炮「啪啪」響，堂屋裡，家簽前，一對新人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對拜後，七大姑八大姨前來「受禮」（接受一對新人鞠躬致禮，不過受禮後得摸出兩三角人民幣放到新人面前的喜盆裡）。儀式完畢，支客師宣佈開席。

這時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經坐到了飯桌上。支客師就扯開嗓子向大家喊道，「鄉里鄉親打個讓手，新娘家裡的客人遠遠而來，讓他們先吃！」那些坐上桌子的老人就會自覺讓出座位，附帶也把自己的小孩牽下桌來。又是一掛鞭炮響後，端盤的小伙子腰上繫着一條紅布，雙手端着放上菜餚的木製條盤，嘴裡喊着「拐子，拐子」，穿梭於人群和飯桌之間，將菜餚一個碗一個碗地放到每一張飯桌上，放完又回廚房端第二道菜，直到將菜餚全部端上飯桌。第一道菜是糖果糕點，第二道菜是涼拌肉，第三道是「香碗」，也就是圓子，現在人們叫它「蛋鼓元」，第四道菜是酥肉，第五道菜是蹄子肉，第六道菜就是芹菜炒肉絲，第七道菜是渣粉子（用紅苕和糯米一起蒸的米飯），接下來就是竹筍、海帶、粉條、芸豆、蓮花白、紅蘿蔔、白蘿蔔等。當然，青菜是絕對不能擺上宴席的，否則，就會出洋相、鬧笑話，也是對客人的極不尊重。

晚上不像中午那樣人山人海熱鬧了，大部分親戚以及新娘家裡來的客人飯後都回家了。晚飯時隨便上幾個菜葉就可，也不必講究擺幾個碗。對小孩子來說，晚上還有一個精彩的節目，那就是「鬧洞房」（向新郎新娘要喜糖）。喜糖放在新娘娘家送來的嫁妝裡，那些櫃檯箱箱一般都上了鎖，於是大家就向新郎新娘要鑰匙，不給鑰匙，大家就把新郎新娘按在床上揉搓，輕輕拍打，要他們交出鑰匙。新郎新娘裝着要交鑰匙的樣子趁人不備撒腿就跑，大夥兒立即追出去把他們抓回來，直到拿出鑰匙，打開完所有的抽屜，吃了放在裡面的糖果糕點，大家才結束鬧洞房的遊戲，讓新郎新娘上床休息。也不是所有嫁妝的抽屜裡都有糖果糕點，那時候窮不說，購買糖果糕點還需要商業供應票，不是隨便能夠買到的。但大夥兒圖的，就是一個喜慶熱鬧的氛圍。鬧洞房要喜糖也有講究，長輩不能向晚輩要，兄長不能向弟媳要，洞房鬧得再過分，新郎新娘也不能發火，因為這是風俗，據說鬧得愈熱鬧，婚後家庭就愈和睦。也有不需要鬧洞房就給了喜糖的，一位在鄉政府工作的表哥結婚，不到10歲的我和父親一起去參加婚禮，瞅準機會，我悄悄對新娘子說：「表嫂，晚上給我吃點喜糖好不好？」年輕



當今的「九大碗」早就超越九個菜，也成為旅遊美食的招牌。

漂亮，也在鄉政府工作的表嫂看我一眼，說：「不用晚上，現在就給你。」接着從兜裡掏出一大把糖來塞給了我，把我樂得像隻快活的小鳥。

第三天回門。娘家的兄弟帶領一幫親戚放着鞭炮前來迎接新娘新郎回家看望父母，早飯依然要擺「九大碗」。娘家兄弟和來的親戚還要被請到堂屋大桌上，娘家兄弟要坐「上八位」。吃完早飯，新娘新郎和娘家兄弟一行人走後，鄉里鄉親開始歸還桌椅板凳，熱熱鬧鬧的「九大碗」宣告結束。

為什麼端盤的小伙要喊「拐子」而不喊「讓開」呢？父親說，「拐子」就是要撞到你，請你讓一下的意思，「讓開」就是請你走開的意思。主人家辦九大碗，來者都是客，如果直接喊讓開，怕人家多心，認為說他是多餘的，生氣走了。我知道父親早年曾拜師學藝，行走江湖，見多識廣，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父親和母親每次去吃九大碗，都要「包肉」，也就是把宴席該他吃的那一片肉拈來擱在一片青菜葉或芭葉上，帶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那時候村裡人都有這個習慣。每一次我心裡都湧起小小的期盼。如果遇到我去吃九大碗，我也把肉包回家，和父母姊妹一起分享。

「九大碗」桌上吃剩的菜混裝在一起叫「傳菜」，其實也就是大雜燴罷了。一九七七年臘月，大哥結婚，三天下來，傳菜不少，母親送了一些給鄉里鄉親，用一個很大的陶瓷缸把傳菜裝起，裝了滿滿一缸。那頓在鍋裡熱一下給我們吃。剛開始我很失望，因為裡面也就是一些海帶、蘿蔔、白菜之類了，連肉渣和骨頭都很少。但一個星期後，缸裡的菜開始變得有點酸酸的，酸過之後味道可口，連白蘿蔔、紅蘿蔔都徹底渣香美，每頓飯我們把鍋裡的湯都吃得乾乾淨淨。直到現在，我也沒吃過那種味道香美的菜餚了。

書若蜉蝣

葉輝

馬場大火與咖啡園墳場

話說黃泥涌村大片農地1854年闢為馬場，3年後跑馬地馬場落成，一年一度舉辦「周年大賽」舉行3至5日跑馬賽事，吸引不少中外人士入場觀看；1918年2月26日為周年大賽第3日比賽，一個看台棚架突倒塌，棚底為熟食檔，觀眾無從走避。

1953年12月底至1954年1月初，鰲洋客在《華僑日報》撰文，憶述「火燒馬棚」；他指當年馬場有4,500名馬迷入場，火災時多人走避不及，半小時內已燒成「人炭」，身體支離破碎；警察和消防員到場時僅可收屍，屍體放在馬場上讓親屬認領，辨認不到的就運到山上荒廢的咖啡園埋葬，運屍山路當時尚無名稱，後因東華醫院落成而命名為東院道。

鰲洋客更提到，死難者遺下不少金銀首飾，找到金銀146隻，金戒指255隻，潔淨局工人將肉碎收拾並包好，運到鵝頸橋的碼頭扔到海中；一個富家女人見狀，遂撈起其中一包，以為有金執，豈料為死人的頭顱。

事後東華三院負責賑災，與港府合力將咖啡園設置為公墓，1922年即火災發生4年之後，公墓落成，建有「馬棚先難友紀念碑」，以紀念死難者；直至半世紀之後，紀念碑及公墓於2010年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港府去年更列為法定古蹟。

咖啡園墳場在掃桿埔樂活道，為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公眾墳場，於1891年開辦；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罹難者悉數安葬在咖啡園墳場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公墓；1952年興建香港大球場搬

遷部分墓碑，1961年不再接受安葬申請。

就在1916年，一位從巴西回國的華僑，帶很多巴西咖啡種子回來，由於為當時咖啡主要銷售地，因此便來港找尋咖啡的地方，他看中掃桿埔旁邊的一座山，認為土質氣候適合種植咖啡。當咖啡樹苗移植到山上時，咖啡樹生長得不好，不少樹苗移植後就枯死了，令他所有的投資完全沒有任何收成，最終遂放棄咖啡園。

約於上世紀30年代，成和道尾興建道路，工人掘路時發現到一堆骨，自此就有跑馬地亂葬崗之說；其時為戰前時期，故此推斷以前的華人慣常葬在山邊；翻查史書記載，就在1942年2月22日，本港成為日本軍事佔領區之後兩日，當時一班女性被日軍抓到藍塘道的其中一間住宅內強姦；女士出門之後發現一班男人屍體，料為遭日軍所屠殺，便草草把他們埋葬了事。

另外，亦曾有一批醫護人員意欲離開跑馬地一個防空洞，最終醫護人員投降，卻遭日軍所屠殺，亦有可能令此地成為亂葬崗；禮頓山及對面木球會位置原本俱為英軍之軍營，就本港保衛戰時期，英軍曾與日軍在此地爆發激戰，但由於死傷不及赤柱一役慘重，故此較少人提及。

經東華全力爭取，咖啡園公墓落成，名為「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公墓」，又建立「馬棚先難友紀念碑」，紀念及慰藉死者；咖啡園公墓據說就在大球場後山，但地處偏僻，很少人會前去，遂成為湮沒的歷史。

詩詞偶拾

俞慧軍

斑斕的秋天

綺麗的晚霞
在季節的界線俯瞰
秋風滑翔天籟
抵達芬芳氤氳的城郭
抵達你溫馨的心靈驛站
萬家燈火的窗花
日以繼夜地收集日子的喜悅
一座城市被季風吹着走過
走過喧嘩與寧靜
走過浪漫與經典
花雕玉刻的城池
敞開一扇扇幸福的門扉
讓歲月的搖籃長滿相思
長滿鮮花盛開的記憶

斑駁的古城牆
纏繞着紫藤與瓊花的舞姿
仰視你雄偉的身影
波詭雲譎的新城大道
留下一盞盞璀璨的燈火
多想貯藏五彩繽紛的故事
讓古老與現代締結金蘭之交

浮城誌

星池

努力不懈

「知道嗎？『努力』是你的摯友，它絕不會背叛你，所以不要放棄！」爺爺泛起慈祥的笑容對孫兒說。

「我不僅僅輸掉了比賽，近來無論花多少時間練習，好像進步不多。」孫兒瞥被他隨意拋在沙發上的羽毛球拍，頗為沮喪地回答。

在這萬里無雲的下午，孫兒參加了一場青少年羽毛球比賽。他在賽前曾努力備戰，定好時間表，用盡盡習功課以外的每分每秒去練習羽毛球，可惜最後纖羽而歸，成績未如預期般理想。「我可能不適合打羽毛球，有人也曾取笑我打得非常差勁。」孫兒嘆了一口氣。

「不用氣餒，『努力』是一把傘子，只要你緊握它，便可以為你遮風擋雨，那些惡意說話，根本毋須理會。而且，雨後的景色往往會變得美麗，洗滌萬物。」爺爺說道。

「我不喜歡下雨天，我寧願要一把太陽傘！」經過爺爺的安慰，時間的過去，孫兒重拾好心情，淺笑地續說：「我喜歡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打羽

毛球！」
「你說『喜歡』，這便是你打羽毛球的初衷，不要忘記這一點。這是老生常談，滴水能穿石，『努力』是水滴，一點一點累積，儘管是銅牆鐵壁，也有穿過去的一天。」爺爺堅定地說。

「真的嗎？」孫兒不由得拿起球拍，隨心揮動。「我會繼續打羽毛球，不過技術或許會裹足不前。」

「我常常觀看你打羽毛球，你正一步一步前行，別只看向遠方，忘掉腳下那些進步，這已尚算不錯！」爺爺笑逐顏開：「下次，你教我打羽毛球。」

「當然可以啦！」孫兒不停揮動球拍，續說：「看來我也離不開『努力』這位好朋友了。無論如何，做運動亦可強身健體，不斷地練習，努力不懈，體能及反應必會更好。爺爺！下次再來看我參加的比賽！」

「當然會！」爺爺立即回應，並恍若瞧見孫兒的背上長有羽毛，正展開雙翼飛去嚮往的天空。

豆棚閒話

從那套紅都西裝想到的

周曉沛（中國前駐烏克蘭、波蘭、哈薩克斯坦大使）

昨天，應邀出席哈薩克斯坦駐華大使努雷舍夫在使館舉行的授勳儀式，我順手穿了平時喜歡的咖啡色西裝。這是一套伴隨我40年外交生涯的官服。

1979年夏，我第一次出國常駐，外交部發了1,100元置裝費。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我不知道該怎麼花。在國內，每次參加外事活動前，都要憑單位的介紹信到行政司生活科借中山裝，用完當即歸還庫房。部裡的老同志囑咐我，外交官出國要穿得體面，一定要買上好純毛衣料，除了國慶等正式活動需中山裝外，還要做兩套帶馬甲的西裝，再配上鏗亮的三接頭高檔皮鞋。因莫斯科天氣寒冷，必須買皮帽和厚呢子大衣，可謂從頭到腳全副武裝。

外交部的定點出國服裝店——紅都位於東交民巷，其品牌起源於有着百年歷史的紅幫裁縫。1956年為解決北京做衣難的問題，在周恩來總理親切關懷下，專門由上海遷至首都。裁縫都是南方師傅，態度和藹，做工考究，穿起來非常合身。我選定了襯衣，包括一件大花的。據使館同事告知，當下莫斯科使團中流行此款，實際上只穿了幾次就不敢穿了，國內來

出差的同事笑我太潮了。遵照老同志的交代，特地做了兩條西褲，老師傅誇我說：「小伙子，蠻有經驗嘛，褲子磨損快，確實需要備用的。」這次我穿的就一直保存在家裡的備用褲。

那年代，我們國家窮，出國人員只拿生活津貼，每月就40多元外匯人民幣，但國內56元工資繼續保留，被稱為「雙工資」，還挺知足的。中低級外交官不讓乘飛機，只能坐火車，從北京到莫斯科得一個禮拜，包括一些赴非洲使館的也得繞道莫斯科，大家都習以為常。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不讓帶夫人，更不要說孩子了。這在世界各國駐外使館中，算是獨此一家。使館領導得知我夫人也學俄語，而且是領事幹部，專門向部裡打了報告，過了一年才調到使館。部裡不少老同志，因夫人在外地，沒有北京戶口，不得不長期兩地分居。記得有一次，外交部派我去外經貿大學做招生廣告，不少同學都關心出國待遇問題，我就講了上述情況，他指出，現在「烏槍換炮」了，已與國際接軌，不僅工資大大提高了，可以帶配偶、兒女，而且丈母娘也可去帶孩子。同學們聽後都樂了。同時我強調，想進外交部，要有吃苦的

思想準備，舒舒服服當不了外交官。兩年後，我在部裡碰到一位年輕人，他主動與我打招呼說：「周大使，當時我就是聽了你的報告後，決定報考外交部的。」我問：「後悔嗎？」他搖了搖頭。我很開心，看來還真沒白忽悠。

回想起那時的許多東西，貨真價實，不用擔心受騙上當。就說那套西裝，穿了近40年，還是挺挺的，沒有變形。不過裡子破了幾處，還有開線的，我都自己及時縫補上。我想好了，以後去見馬克思時，也要穿上這套西裝。如老馬有興趣，不妨與他分享相關的故事，從中也了解到中國改革開放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這套咖啡色西裝是伴隨作者40年外交生涯的官服。 作者提供

生活點滴

素未謀面的父親（上）

羅偉民

父親對我來說，在我人生的前十七年間，僅僅意味着一個名字。我從沒有見過父親，撫養我的姑母姑丈也沒有對我提起過父親姓名以外的其他信息。同樣，在那些年中我也沒有見過母親的龐龐。小時候，每當我在香港街頭見到父母牽着其他小朋友散步，心中總是泛起一絲苦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我隨在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來到北京，開始在北京讀書生活後才逐漸透過歷史的迷霧，一點點窺見到父親偉岸的身軀。

父親的腳步——投身革命永不悔

父親羅登賢，據姑母與姑丈說，原名為羅舉，1905年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一個貧苦人家。幼年時，祖父母就已經雙亡，生活非常艱辛，之後父親來到香港投靠姑母與姑丈。11歲就跟着姑丈到太古船廠當學徒，學習安裝電燈，學做鉗工。4年學徒期滿後，又當了6年鉗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父親就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0年4月，香港5,000多名機械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父親與太古船廠工人一起積極參加罷工鬥爭，反抗英國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1922年初，作為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父親當即在太古船廠召開工人大會，號召工人要將罷工進行到底。在楊殷等在港活動的共產黨人的影響下，父親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於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擔任

香港海員工會秘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浪潮，在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父親參與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領導工作。罷工結束後，父親繼續領導運工工作，成為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父親作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參與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他冒着極大危險往返於香港和廣州之間，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失敗後，他被迫轉移到香港繼續開展秘密工作。

在六大召開的過程中，父親作為中央臨時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與鄧小平同志共同主持工作。在留守中央的過程中，父親與李維漢、任弼時同志一起，在極度困難的形勢下努力發動群眾，運用靈活的鬥爭策略，使處於低潮的中國革命漸漸獲得復興的生機。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父親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相繼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全國總工會常務會負責人、中共中央軍事部書記等重要職務，領導江蘇、廣東及全國的工人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黨中央派父親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到東北指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12月，父親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他領導東北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成為黨在東北發動抗日鬥爭的領導者。在東北工作期間，父親留下了這樣鏗鏘有力的話語：「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要提出這

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誰就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父親的話，堅定了東北共產黨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祖國爭取東北解放的決心。

父親領導滿洲省委積極整頓各地黨的組織，加強對東北抗日鬥爭的領導。帶領滿洲省委貫徹統一戰線政策，加強對抗日義勇軍的指導和協調工作。父親和滿洲省委對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各種抗日義勇軍高度重視，發出一系列指示，加強對義勇軍工作的指導。根據東北義勇軍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策略與他們加強聯繫，派遣黨員、團員到義勇軍中去，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募捐以支持義勇軍的鬥爭。這些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後來發展成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組成部分，成為東北抗日武裝的中堅力量。

1932年7月，因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父親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滿洲省委書記職務被撤，並於12月強行將他調回上海。到上海後，他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他組織上海紗廠和鐵路工人罷工，主張全民族抗日，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圍剿」紅軍。1933年3月28日，父親出席全國海員工會會議，由於被叛徒出賣，國民黨特務將他和廖承志以及在上海治病的陳賡等五人逮捕。雖然宋慶齡等民主人士多方營救，反動當局還是卑劣地對父親痛下殺手，8月29日，父親被反動當局在南京雨花台殺害。